

媒体的底线

■王子臣

近来,陈永洲事件被炒得沸沸扬扬。10月26日,面对中央电视台的镜头,陈永洲发出“要以我为戒”的追悔,一言惊醒媒体人,陈永洲的忠告和警示给记者们上了生动一课。由此不仅引发全社会对媒体道义责任和使命的追问,也引发媒体如何开展自律与他律的讨论。人们在郑重思考:媒体的底线是什么?

职业底线

真实是新闻的生命,也是记者和媒体必须坚守的职业底线。如果信口开河、弄虚作假,捏

造事实,“创造”新闻,媒体的公信力就无从谈起。

作为已经走过15年之久的《新快报》,对记者的采访报道应该严加审核。特别是经济类的负面报道,事关企业存亡,更应慎之又慎。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,陈永洲先后发表的10余篇中联重科负面报道中,只有“1篇半”是在他人安排采访下完成的,有的甚至看都没看,就自己署名刊发,并成为系列曝光的重头稿。对如此严重违反新闻真实性的稿件,《新快报》竟出现常识性失误这种做法令人匪夷所思。

《新快报》上演这出丑剧,不但自取其辱,

社会信誉扫地,也极大损害了媒体的整体社会形象。《新快报》的教训之一是:你不尊重事实,事实将把你打得粉碎。

道德底线

媒体报道的原则是中立、客观、公正、平衡。媒体一旦异化为权贵的走狗和金主的奴才,其做出来的报道,也就毫无客观公正可言。受人指使,收人钱财,在未经核实的情况下,连续发表多篇捏造事实的报道,陈永洲事件让媒体的黑色交易无所遁形。其实陈永洲事件也绝不只是个偶然现象。媒体和记者与恶势力同流合污,自甘堕落,搞“有偿新闻”成为常态;拿人钱财,替人消灾成为潜规则;恶意炒作成为见怪不怪的现象;打着舆论监督的旗号,敲诈勒索也时有发生。无良媒体已成为社会公害,记者也被污名化为“妓者”,“防火防盗防记者”所表达出的正是社会对媒体的极不信任。

陈永洲事件的教训是:道德迷失的记者,无疑在干男盗女娼的勾当。

法律法规底线

在当今尚不健全的法治精神和市场环境下,有个别掌握着庞大舆论话语权的媒体,把自己摆在一个比较特殊的地位,高举着新闻监督的道义旗帜,飞扬跋扈,为所欲为。他们为钱驱使,唯利是图,颠倒黑白,侵犯隐私,肆意诽谤,伤天害理,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。陈永洲事件为一些“特殊媒体”敲响了警钟。

陈永洲损害了一个上市企业的商业利益和广大股民的切身利益,其行为不仅超出了职业道德底线,也超越了法律法规底线,这种直接挑战新闻职业道德和法律法规底线的行为,结果招致警察跨省拘捕,刑事拘留,依法判决也在必然之中。事件暴露出媒体自律机制的严重缺失,也暴露出新闻主管部门严重的失职失察。广东方面迟到的行政处罚,是在记者被刑拘并承认有罪之后才做出的。如果及早对《新快报》进行全面整顿,也许不会有这场无妄之灾。历史和现实证明:媒体和记者都应当严格自律,不自律,必他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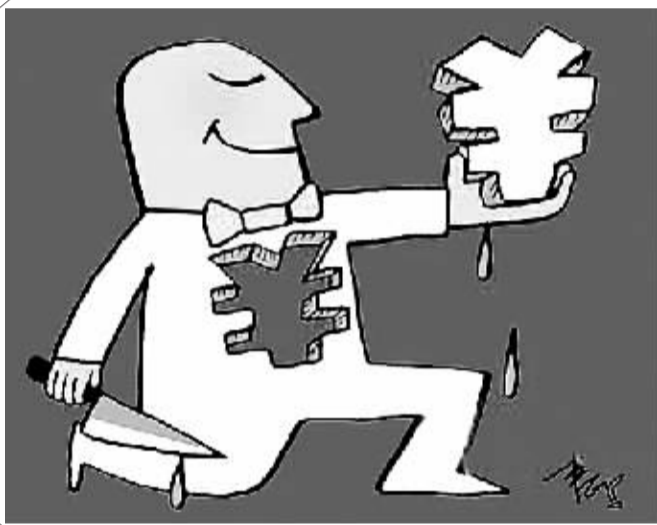
“土豪”求婚

■文/小正 图/春鸣

11月24日,扬州一家花店接到一份特别的花束订单,客户要求用100张百元人民币制成花束用以求婚之用,店主考虑到相关法律,再三推辞,后在客户的强烈要求下接下订单,采取无损损伤粘连的办法按客户的要求完成了制作。

“土豪”一词突然走红,曾令不少人感到纳闷。现在看来,这种现象并不意外,因为当今社会,土豪和他们的“土豪式”行为屡见不鲜,反复给人们带来强烈的感官刺激,他们走红似乎成为必然。按说,用一束芬芳美丽的鲜花向心爱的人求婚,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,可到了土豪这里,美丽的鲜花却变成了用百元大钞扎成的“钱花”,芬芳和浪漫也被铜臭和庸俗取代。当然,与前不久浙江义乌那名叫“土豪准新郎”的102公斤百元人民币彩礼相比,扬州这名土豪还是“小巫见大巫”了。

土豪炫富虽属个人举动,但给社会带来的负能量却不可忽视——既容易加剧人们的仇富心理,也助推了“拜金主义”的蔓延。昨日一则报道说,有小学毕业生给同学赠言“为了人民币加油”,这或许是土豪摆阔产生的最令人担心的影响。



“围观”中 有不泯的天良

■董碧辉

昨天有则报道在网上讨论得很火热。说的是浙江金华有一个老人摔倒在路面上。当时正是早高峰,来往的行人和车辆很多。看见老人摔倒,有些人径直走开,也有不少人停了下来。可是,停下来的人你看看我,我看看你,谁也不敢上前扶起老人。

饶有意思的是,虽然不敢扶,但是这些人在老人身边围了一圈。围了一圈和径直路过,还是有着很大区别的。记忆犹新的是当年的小悦悦事件,被撞倒在地的小女孩,无助地躺在地上,一路上有18位路人经过,可是没有一个人停下来,帮她一把。

围是一种态度。朋友圈里面都是朋友,小照片发着,心灵鸡汤灌着;校友圈里面都是校友,师兄师妹叫着,学校时光共同缅怀着;商务圈里面都是生意人,利益交换着,项目沟通着。而老人身边的一个圈首先表明了这样一个态度,他们没有对摔倒的老人视而不见,没有选择冷漠地走开,而是用自己的躯体,构成了一个安全岛,一个翼护着老人的圆。

他们围了起来,可是不旁观。有的在给120打电话,有的叫来了路口的协警。但是他们还是有所顾忌,有人就说了,“真心不敢扶”。真心不敢扶,是因为四川达州扶老人被讹事件,犹在眼前,与此前媒体报道的种种扶了反而惹祸上身的新闻重叠在一起,构筑成一道难以逾越的心理之墙。要是去扶了,扶出问题怎么办?这样的一个问题一打,就犹豫了,退缩了。

在我看来,也许有很多个老人曾倒在路上,很多人经过,将老人扶了起来,无讹诈,不纠纷,挥一挥衣袖,只留下感谢和温暖。将老人扶起来不算新闻,不扶老人才是新闻,才是稀罕事,这遵从我们基本的生活逻辑和价值判断。试想一下,当扶起摔倒的老人成为新闻,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时,整个社会的道德处境显然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。于是,我们经常看到的是扶老人扶出问题的阴暗面,而不知道有多少正能量没有得到释放的空间。

我想,这样一个问题应该代表了大多数数人遇到此类问题的真实反应。他们心怀善意,但又害怕伤到自己。怎样越过这一道心墙呢?想起北大校长为了鼓励校友讲诚信、做好事、做有道德的公民,表示“如果中间发生风险,比如扶起摔倒的老人被起诉,北大无偿提供法律支持,如果败诉要赔偿,北大出20万,多出的由校友募集支持。”需要更多这样的撑腰体。

欲知曹操后人相聚后事,且听下回分解

■高路

失散多年,流落辽宁的曹氏三支后代终于在沈阳相聚。从曹操以下那辈算起,这一别怎么的也有一千多年的时间了。看来,走之前不打个招呼的确是坏习惯,弄得子子孙孙们相见不相识,望穿秋水啊。

仇人相见分外眼红,这亲人相见完全是另外一番场景。聊着爷爷的爷爷的往事说着那一千多年的沧海桑田,虽说,岁月如梭,可是三支来自不同地方,隔着好几个大城市的曹氏后人居然模样也长得神似,都是浓眉大眼,颇具名将后人的遗风。果然虎父无犬子,走到哪,血管里流着的都是祖先的热血。我想,复旦大学研究得出的这个结论足够他们兴奋一阵子了。

开枝散叶与认祖归宗都是中国文化埋藏得最深的那一部分,我是谁,我从哪里来,也是永恒的人生命题。几支曹氏后代想要寻找自己的祖先是

人之常情。虽然我们看不出认一个一千年多前的老祖宗到底有什么实际意义。但有些人觉得重要,觉得这是有别于常人的一种符号,我们也能理解,毕竟有个光荣的祖先是件很风光的事。你看,姓秦的,就从来不好意思向别人吹嘘自己的祖先。

曹操虽然做过不少“宁教我负天下人,休教天下人负我”的丑事,但总体说来,这是个中国历史上了不起的人物,分久必合,合久必分,能重整破碎的山河的人都是伟大的,认上这么一个祖先,哪怕得不了什么好处,好歹对家族也是个安慰,可以指着自己的孩子说,曹某某你别忘了,你可是曹操的第N代孙子,你得有点出息。

可是认了亲以后又能怎么的,生活还得靠自己过,蒙祖先福荫的年代早已过去,有一个伟大的祖先,扯一点贵族的族谱,不会比别人多一点筹码。老是记着祖先的那点事,姓刘的和姓曹的该有好几世的仇恨了。何况,从曹操那个年代再往前推三四千年,大家都是一家人,都是名门之

后,按照进化论的观点,全球人类都有一个来自非洲的共同的祖先,那你跑到非洲的某个角落里,看到一个衣不蔽体的黑人,会不会也在心里由衷地喊一声:亲人啊。

当你为一个虚名热血沸腾时,有些人却在窃笑。曹氏后人在我们这,那么后人给祖先立个牌位,开个陵园祭拜什么的就是理所当然的事,再找几个学究考证一下,正本清源,说不定还能整出个三国园、曹孟德望梅止渴之类的旅游景点来。孙猴子那子虚乌有的故乡都有人抢,我们这有最权威的科考论证的后代在这,总能扯出点花样吧。而且这种事宜早不宜迟,谁动手快就抢得先机,到时,让别的曹氏后人哭去吧。

由此看来,认亲只是敲了声开场锣,接下去,该有各式英雄人物要登场了,围绕这曹操血脉,该有一番激烈的争斗,人类的创意是无限的,永远不要低估了个别地方要发展的决心,大戏刚开锣,真正的主角还未上场,欲知后事,且听下回分解。

建“弃婴岛”更要建保障安全岛

■杨燕明

深圳福利中心近期透露,将在明年年初建起深圳第一个弃婴岛。所谓弃婴岛,是效仿发达国家的做法,为弃婴提供室内庇护场所,设置有保温箱、排气扇、被褥,保持适宜的温度、湿度和充足的氧气,来者只需要在离开前按一个延时按键,几分钟后就会有人来将孩子送到福利中心。

或因家境贫困、或因婴儿患有绝症、或因不足为外人道的秘密……“遗弃婴儿”的事情,虽然被质疑、被批评、被谴责,但还是时有发生。尽管我国《刑法》第261条明确了遗弃罪——即指对于年老、年幼、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,负有扶养义务而拒绝扶养,情节恶劣的行为,应给予法律制裁。但一个“情节恶劣”,并无配套的法律解释文件,遗弃罪的罪名很难被戴到遗弃者头上。

建“弃婴岛”之事引发了不少质疑。有人表示

这是在间接鼓励弃婴。这样的说法其实是站不住脚的。真要狠心遗弃孩子的人,无论是否有“弃婴岛”,都会遗弃;没想过遗弃孩子的人,也不可能因为弃婴岛的建立而弃婴。于弃婴数而言,不会因为建了弃婴岛就增多,也不会因为没建弃婴岛就减少。厘清了这一层利害关系,便可知建弃婴岛决策的背后,是对生命的重视,并没有任何亵渎生命的嫌疑。

据调查,丢在福利院附近的弃婴入院后存活率不足50%。小孩一旦被遗弃,有一半的概率等于判了死刑,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下,石家庄才建立全国首个“弃婴岛”,建立后,最初发现的26名弃婴,18名活下来了。如今深圳的效仿目的是一致的,就是最大限度地保障孩子的生命。这背后生命至上的理念应成为社会共识。正如石家庄社会福利院院长韩金红所言:“我们改变不了遗弃这一行为,但可以改变遗弃的结果。”

不过,建“弃婴岛”只是第一步,接下来还有更

多工作要做。如完善弃婴的保障制度,让孩子们被遗弃后也能享受到必要的救助;如完善弃婴的收留机制,当前我们的收留制度,的确有些瑕疵,即便政府的福利机构收养能力有限,民间收养的行为仍没有足够地放开,这亟须改变……弃婴岛救下了孩子第一次生命,仍需要社会保障机制的无缝对接,才能给予弃婴们“第二次新生命”。

自然,公众对遗弃婴儿行为本身的愤怒,也是情有可原的,但我们如果光有愤怒没有行动,对孩子而言,并没有多大的实际价值。而建弃婴岛显然是一种努力,深圳市福利中心法律顾问郝先生也认为,“弃婴问题是社会问题,与很多因素有关,与其堵,不如疏,健全社会保障制度,以便让这些孩子的生命权能够得到保证。”诚如斯言,我们与其停留在对弃婴者的谴责与愤怒上,不如多做一些努力,如建“弃婴岛”、建保障安全岛等,如此,才能最大限度地呵护好弃婴们神圣不可侵犯的生命权。